



江南其人其事其案

石 叩

店，经商谋生，继续写作。一九七八年，迁来旧金山，在渔人码头开磁像店。经济上既无后顾之忧，江南遂集中精力于写作，《蒋经国传》之前几章，就是此时写的。江南前妻刘冠群，生一子，现供职于美一电脑公司。一九五九年因意见不合离婚。一九六七年，与崔蓉芝结婚，生一子，现年十三岁。江南遇刺时年仅五十二岁。

秉笔直书 惨遭杀害

是谁杀害了江南？还得从《蒋经国传》谈起。一开始当他以此为题撰写博士论文，向新泽西的“中国国际基金会”申请补助时，就遭到其中与台湾有关的中国董事的否决。《蒋经国传》“来台以前”的部分，十年前曾在香港《南北报》月刊发表，一九八〇年曾出过单行本；真正冲击性较大的是“来台以后”的部分。这部分十个月前即在加利福尼亚州的《论坛报》刊载完毕，经过修改的《蒋经国传》的单行本已经问世。江南的写作是非常严谨的，书中的资料，有许多是江南亲从许多历史见证人口中得来的，而且从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和国会图书馆翻阅了大量的珍贵档案材料，包括蒋纬国、王升等都是他索取第一手材料的对象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我脱下情感的有色眼镜，帮助对历史有研究兴趣的读者，找到历史的片断和零碎……主要是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，秉笔直书。”而这些就必然触及台湾当局的疮疤和蒋家父子的隐私，这当然是台湾当局所不能容忍的。正象谢善元教授在《江南著蒋经国传序》中说的：“大家都希望能越过歌功颂德的马屁文章，以及经过删节的自白，穿过种种假象，直观真象……他的基本态度，只是‘用史家的态度来评定一件事或一个人的功过’。”

“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，人间自有是非，公道终在人心，读者看了蒋传后自有评价，无须台北劳神防范。”

促使江南被暗杀的另一个原因是江南正在准备写作中的吴国桢传。据知情者透露，当年蒋介石为蒋经国问题和吴国桢闹翻，吴离台时托“夫人”之庇带走了十二箱资料，包括蒋介石在大陆仓惶撤退时的不少机密手令。吴到美后以此要挟蒋把留到台湾的儿子送到美国，作为不爆内幕的条件。岂料吴手头的材料，最近盛传为江南所掌握，并将陆续抛出，令蒋家父子十分紧张。其实，此事在江南的《萨瓦那访吴国桢》一文中早有伏笔。吴国桢曾感慨地说蒋介石的悲剧是“只会杀人放火，不懂安邦定国”。当江南要求做点笔记时，吴欣然应允，但再三叮咛，他在世时，不能发表。看起来吴国桢毕竟老练世事，深知此道，在世时不敢公布这些材料，以免遭杀身之祸。而江南则以他的春秋笔秉公直书，步无数先烈之后，成为华人在海外

以身殉言的第一位烈士。

联想到当年写蒋经国传时，章孝严、章孝慈曾经跟江南疏通，对他俩兄弟的隐私笔下留情，江南接受了他们的请求。而蒋孝武愿出四万美金作交换条件要江南不出《蒋经国传》，江南却不买账。这下更使这位太子怒不可遏，于是，一套假竹联帮之手，暗杀江南的行动计划就形成了。据台湾某高层人士透露，一九八三年七月，宋楚瑜以新闻局长的身份访旧金山，希望对阻止江南出《蒋经国传》事作最后谈判和解决，由于江南态度坚决，无可商量，宋返台后，即将此事呈报蒋孝武（蒋经国的儿子、台“国安会”副秘书长），并建议采取断然措施。一九八四年，江南发表《吴国桢专访》，且应邀参加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典，使蒋孝武进一步下定了暗杀江南的决心。

蒋孝武决定谋杀江南后，曾向蒋经国请示，蒋未置可否，嘱与担任“总统府秘书长”的沈昌焕仔细磋商。沈主张召集一次秘密的小组会议讨论。参加会议者包括台湾“国防部”、“外交部”、“侨委会”、“海工会”以及新闻局的头头。会议主张“制裁”江南，一方面认为江南触及蒋政权的痛处，且数次前往大陆，主张统一；另一方面认为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及奥运会成绩优异，侨情不利台湾的“海外



斗争”，“制裁”江南，可收对倾向大陆的海外侨胞的恐吓之效。沈昌焕将会议结果告知蒋孝武，并决定由流氓组织“竹联帮”担任制裁任务。出面和竹联帮联系的是“国安会议”的一名顾问。他找到竹联帮的“老大”陈启礼交代任务后，陈要求面见蒋孝武，蒋不允，但和陈通了电话，并告知处决江南的行动，应在蒋孝武访问日本不在台湾期间进行。据此，陈启礼详细制定了谋杀江南的行动计划。由陈启礼具体指挥，吴敦、董桂森充当杀手，俞大钧任司机担任接

送，于十月十五日刺杀了江南。

弄巧成拙 欲盖弥彰

台湾当局原以为这次暗杀事件天衣无缝，同时还准备了万一事情闹大，把一切推给竹联帮并准备以一名“犯了罪的上校”搪塞顶罪的应急措施，以为万全。但是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不为，在海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众目睽睽的洞察下，台湾参与暗杀行动的迹象也越来越暴露，加上陈启礼十月二十一日返台之前，给台湾情报处副处长陈虎门通了电话，已为美情报部门所掌握，就更加无法掩饰事实的真象。于是台湾当局很快就开始了他们早已计划好的“一清专案”，回戈“扫黑”，希冀一箭双雕，把黑社会人物“一网打尽”，把杀害江南的责任统统推到竹联帮头上，以为，“把凶犯关押起来是不泄露机密的最好办法”。所以“扫黑”行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陈启礼。“扫黑先扫竹，擒贼先擒陈”，由“国家安全局长汪敬熙坐镇指挥，直扫陈的住宅，逮捕了他。与此同时，据传逃往菲律宾的案犯董桂森可能已被暗杀。但是陈启礼早已防到这一招，他在美暗杀江南期间，就故意以“情报局线民”的身份，把事情的经过，来龙去脉录制了三盘录音带。其中一卷交竹联帮在美绰号“白狼”的张安乐，一卷交绰号“黄鸟”的竹联帮分子，一卷带回台湾暗藏家中，并嘱张安乐等人，如他在台被“一清专案”逮捕，可设法用录音带救他。陈被捕不几天，美已传出得到了有关江南命案的录音带的消息。欲盖弥彰，弄巧成拙，在大量确凿事实面前，台湾当局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情报部门有人“涉嫌”，并拘押了情报局长汪希苓、副局长胡仪敏及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。

目前，江南被害案还远没有了结。但是，不管美国作何处置，台湾当局何以对待，他所造成的影响，引起的波澜是任何人都无法掩盖的。正象台湾大学教授傅湖所说的：“这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。他可能会破坏‘政府’的形象……我相信他比水门事件更为严重。”国际舆论也强烈呼吁：“台湾必须把这件事情清查到底。他还必须停止谋杀刘宜良的事件达到高潮的这种情报活动的方式。”而这一切必将使台湾当局自食其果，遭到重大的政治危机。

江南先生的血是不会白流的。他用他那刚正的笔，不朽的生命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又谱写了一曲正气歌。“抽刀断水水更流”，与那些暗杀者的愿望相反，杀害江南不但不能逆转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，反而会唤起海内外更多的炎黄子孙对伟大祖国的热爱，为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前赴后继，英勇奋斗！

（题图 插图 林积令）



少年飘泊 弃戎从笔

江南本名刘宜良，一九三二年生于江苏省靖江县。九岁丧父，由祖父抚养长大。江南从十五岁起便开始独立生活，备尝人间辛酸，也没有机会受完科班教育。但是少年时代他那位望孙成龙的祖父却对他教养极严，常常教他熟读古书，尤其是《古文观止》，虽然当时他对这些填鸭式的教育大为反感，但事实上却使他终生受益不浅。江南的文章言简意赅，文笔流畅，与这个根基不无关系。

一九四九年，江南只身飘泊台湾，次年入台湾“国防部”政干班，班主任是蒋经国。毕业服役两年后再入干校。当时他已听厌了“一年准备，两年反攻，三年扫荡，五年成功”的滥调，对军中生活十分厌倦，决心弃戎从笔。毕业前的三个星期，当他得知已被分配在驻高雄的八十军时便挺身走险，在同学们排队去礼堂举行毕业典礼之际，和带队的分队长当场冲突，并主动到禁闭室报到。当天下午，队长张善鉴前来劝说，要他写一张悔过书，一了此事。他率直地回答：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无过可悔。于是，校长王永树下令“开除”。江南在日后的《蒋经国传自序》中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说：“其实，干校没有开除我，我开除了干校。”

脱离军队后，他先求读于台北市师范大学英语系。后担任台湾日报记者，曾被派往香港、菲律宾及东南亚各国采访。回台湾后写成《香港纪行》、《动乱的东南亚》二书。一九六七年，被派往美国华盛顿。工作之余，江南申请进美利坚大学，攻读博士学位。一九七二年，修完课程，准备撰写论文，而其题目，正是蒋经国的生平及其政治理想。以后因为所申请奖学金无着落，遂在华盛顿市区之“郎芳购物中心”开设礼品



墨竹

税友民 作



竹 联 帮

竹联帮是台湾的一个黑社会组织，因开始在永和县竹林内歃血为盟而得名。陈启礼是竹联帮的“老大”，曾被国民党逮捕过；出狱后，他依靠他那伙弟兄，一边继续搞黑社会活动，一边利用所得的钱经营消防器材，接着又办了《华美导报》，报道黑社会人物背景、火併内幕和工商界巨头的密闻艳事。钱越来越多，竹联帮的组织也越扩越大，成了台湾黑社会的最大组织；以后又因与日本黑社会组织

口组合伙诱骗台湾少女去日本卖春走向国际，与香港的十四K、美国的华青帮等流氓组织挂上了钩。在台湾有“白天是国民党的，晚上是竹联帮的”之说。坏事越干越多，人民越来越恨，竹联帮就千方百计地在当局找靠山。在这个背景下，陈启礼等与台湾情报部门拉上了关系，在情报部门的支持和指使下杀害了江南烈士。